

中国越学

ZHONGGUO YUEXUE

【第五辑】

主编◎谢一彪



不痛我無獲昔人無感之由
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
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
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
猶今之視昔也悲夫故列敘時
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
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之
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越学

ZHONGGUO YUEXUE

【第五辑】

主编 谢一彪
执行主编 潘承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越学》第五辑/谢一彪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 - 7 - 5161 - 3338 - 5

I. ①中… II. ①谢… III. ①文化史—研究—浙江省 IV. ①K295.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566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 媛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16
印 张 19.75
插 页 2
字 数 469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顾 问 陈桥驿 董楚平

编委会成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建华	王能宪	史晋川	卢敦基
叶 岗	朱志勇	肖金城	寿永明
李永鑫	陈伯海	邵 鸿	周一农
费君清	高丙中	高利华	曹锦炎
陶 侃	章 融	谢一彪	葛剑雄
董乃斌	曾 骅	梁 涌	潘承玉

主 编 谢一彪

执行主编 潘承玉

责任编辑 钱汝平

目 录

区域文化研究专辑

徽州人文与地域学风	徐道彬 (3)
地域文化与孙吴道教	陈金凤 (12)
河源古邑与客家文化建构	罗 勇 (25)
南风北土与盛唐之音	刘 畅 (36)
科尔沁蒙古族的历史文化与说书艺术	何红艳 (47)
东北习俗“拉帮套”的历史人类学解读	魏志龙 (52)
桂东南科举家族的社会关系与科举事业	
——以玉林高山村牟氏家族为例	李伟中 (60)
新形势下的庐陵文化研究回顾与展望	邓声国 (73)
汪毅夫先生与闽南文化研究	
——以《闽台缘与闽南风》为例	孟建煌 许元振 (79)
文学地理学与区域文学史的重构	徐玉如 (86)
区域文化视野中的清初明遗民散文网络	潘承玉 (92)
江南文化务实特性的历史解析	陈国灿 (104)
论江南传统文化的礼俗两重性	陈彩云 (111)
唐代江南顾氏家族的家学精神与文学创作	曾羽霞 景遐东 (117)
宋代江南书籍供给的主要特征及其影响	张锦鹏 (125)
明清江南戏曲选本刊行概况及地域文化特色	刘天振 (136)
试析唐后期两浙地区动乱的特点及其成因	刘 丽 (152)
略论宋代两浙地区书院的地域特征	郑瑞鹏 (162)
近代浙江秘密会党浅析	谢一彪 (168)
越文化视阈:区域文化与文学关系的思考	王嘉良 (177)
越文化与区域文化研究	周幼涛 (186)
两汉越巫文化探赜	吴从祥 (192)

东汉六朝会稽名士群	任桂全 (199)
会稽本土士族的创作及其对中古文学发展的影响	渠晓云 (207)
越文化背景下蔡元培的美学选择与美育实践	马芹芬 (220)
鲁迅·魏晋风度·越文化——从唯美主义的角度	李红霞 (227)
胡愈之:胆剑精神的传人	朱文斌 (235)
论元代“续兰亭会”	邱江宁 (241)
吴兴祚幕府与清初文坛	朱丽霞 (252)
“杨门七子”刍议	白建忠 (263)
“西园诗社”遗民诗群考论	李婵娟 (272)
明末清初阳羨姻戚曲家群体的戏曲活动及其文学意义	邢蕊杰 (286)
会稽山香榭林申报世界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背景报告	张校军 潘承玉 (294)



区域文化研究专辑

徽州人文与地域学风

徐道彬

徽州文化给予人的最深印象和引起人们关注的最大冲击点，在于其山峭水险的生存环境与儒风昌盛的地域民俗，两者极不谐调的内容却自然地统一在一个对象中，这使得人们无法不追究其内在的生成原因与思想根源。本无生存之境的徽州人凭着勤苦、坚韧和儒家的进取精神，走过了百余年的风雨历程，不仅贾能厚利，而且儒能名高，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和学术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尤其是徽州学者，以其突出的成就而体现出独特的学术风格，也加速了近代以来儒学的转向。徽州的经济财富因徽商的经营有方，而达于鼎盛；其学术文化的特色，也因学者辈出，四处游历而闻名当时，“皖派”学术也因此成为清代学术的中坚。

—

徽州居于山岭之中，得山川灵气，育拔萃人才。戴震云：“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为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然生民得山之气质，重矜气节，虽为贾者，咸近士风。”^①自朱子以后，徽州名儒辈出，著作富有，称于天下，“邑自文简公程大昌、格斋先生程永奇而下，师友渊源，贤哲林立，其鸿篇巨制，见于宋明史志、陈氏《解題》、晁氏《读书志》、马氏《经籍》考者，盖彬彬矣”。^②明代休宁程瞳撰著《新安学系录》，搜集了自宋至明中叶时的徽州学者 112 人，从其传记遗事、碑铭资料中可见此一时期的徽州学术发展概况。近人蒋元卿所撰《皖人书录》，上起春秋战国，下至五四运动，搜集皖人著作 17000 余种，作者 6600 余人，其中大半都是徽州人。

至于徽州为何出现如此多的学者，以及他们的治学经历与学术风格、杰出成就与影响，民国学者对此已有所关注。刘师培云：“徽、歙之地与苏、常、杭、绍同居于江南，何以先儒学术有尚虚、尚实之殊，则以苏、常为泽国，而徽、歙则为山国也。如近

① 《戴震全书》六，黄山书社 1995 年版，第 440 页。

② 《道光休宁县志》卷一五《艺文志序》。

人江、戴之学，均以征实为主，与吴越之学不同。略举二端，余可类示。嗟夫，皖省之民，其特质有三：一曰尚朴；二曰好义；三曰贵勤。此皆所处之地使然，今则风稍衰矣。”“皖省之民尚朴、好义、贵勤，皆因所处之地使然。”^①由此更为印证了上述所论地理环境与民风好尚之大略。梁启超在阐述中国近代学风与地理分布时谈到皖南文化的深厚积淀，以高屋建瓴的眼光，追根溯源，称：“群山所环，民风朴淳而廉劲，其学风坚实条理，而长于断制，此其大较也。”^②并归纳和总结了明清时代皖南学术所呈现出的五个层面：歙县黄生、当涂徐文靖、休宁程绵庄、婺源汪绂、宣城梅文鼎在各领域的卓越成就。“五派各自次第发展，而集其成者为江慎修，蜕变而光大之者则戴东原。”梁氏所列诸人大多终生布衣，而所学借直核通贯，出乎流俗，确实具有求真、求实、求是的特点。徽州学人不仅“尊德性”，更为“道问学”，其共有的学问特点就是不讲求文字表达的情感技巧，辞义上不拐弯抹角，“坚实条理，而长于断制”，即如章太炎所言：“徽州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核而无温藉，不便文士。”其著述“分析条理，皆缜密严栗，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③民国歙人鲍幼文也由徽州人之特性，进而讨论徽州学术，云：“徽州人既因环境关系而形成此种顽强精神，于是守而弗失，虽离乡数十年或数世而犹保持之，由是引起客观上之嫉视，给予一种似讥诮而实褒扬之极妙考语曰‘徽骆驼’，正足以表示徽州人任重致远，不屈不挠之精神也。徽州人之特性既明，乃可进而讨论徽州之学术。言徽州之学术，自当首推朱熹、江、戴，然朱熹、江、戴而外，徽州人之特性不为环境转移，而能另辟畦径，甚且能转移风气者，尚大有人在。”^④徽州学人的勤苦笃实，还可以从《新安竹枝词》中见其一斑，云：“山头木叶脱秋风，庭前共试竹熏笼。逢人问说程朱里，好向篁墩访旧庐。”又云：“紫阳书院崇冈上，四季都闻诵书声。尽道文风今胜昔，新来山长是康成。”“鹿卧牛眠世所稀，命名象物太恢奇。眼前郭璞纷无数，不问何人总地师。”我们从这些“志土风而详习尚”的民间文献资料中，所见不仅有“访程朱阙里之旧庐”，而更多的则是“郭璞纷无数”、“新来山长是康成”。而徽州如此“文风今胜昔”的现象，在“由空返实”的清代，相比于其他地方也是极为突出的一例。

徽州学人的坚实条理而长于断制的学风有两个来源：一是秉承了朱子“道问学”的路数，二则如梁启超所言“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⑤综观清代徽州学者的治学风格，皆以“复古为职志”，摈弃虚理，刊落声华，上溯郑玄、许慎之学，而以质朴笃实为归。他们学问湛深，却大多木讷，不善应对，即使进学，也只做过编修、教谕，次而山长、幕客。钱穆云：“徽人居群山中，率走四方经商为活。学者少贫，往往操贱事，故其风亦笃实而通于艺。”^⑥而且在对待仕进问题上，他们虽不能跳出“科第簪缨”、“学优则仕”的生活理念，却能够在图名未就的情况下，

① 《安徽乡土地理教科书叙》，《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766页。

② 《饮冰室合集》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8页。

③ 《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8页。

④ 《徽州人之进取精神及对学术之贡献》，《凤山集》，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⑤ 《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⑥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42页。

转而以授徒或入幕以治生。譬如，朝廷崇奖实学，曾起用江永，江氏以“驰逐名场非素心”相辞谢；^① 戴震得赐进士后，却说待纂修事毕，乞假南归，觅一书院，不复出矣；^② 金榜贵为壬辰科状元，“散馆后即乞假归，徜徉林下，著书自娱”；^③ 程瑶田自谓：“心境豁达，全不以功名富贵系怀。明年大挑，或可得一官，然亦以淡泊处之。”^④ 从他们的经历和表现可见，科举功名对于真正的学者来说，只是为了免于生计劳苦之累（据清代典制，秀才免于徭役和丁税，廪生每年还有俸米，举人及进士更有优遇），而能一心做学问，他们与“掇拾巍科高第”者不会同流合污，而走着一一条避弃虚华，“为学术而经世”的艰难道路。如此作为虽不合时宜，却是真正的学问所在。

就学术史角度而言，朴学在清代前期仍为超越功利的民间学问，与时文制艺迥然两途。其时虽有一些人对朴学有所涉及或渐成大家者，也大多是在进入官场仕途以后，再转而进入朴学之门的，如纪昀、钱大昕等。^⑤ 乾嘉时期，朝廷倡导实学，也极力欲将在野的朴学纳入学术主流，为其政治服务，于是一批学人对经学考据趋之若鹜。但事实上，真正的朴学家需耐得寂寞，在世俗功利面前有所不为，才能在学业人格上有所作为，既能“博学于文”，又知“行己有耻”，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翻检清代学者履历，很显然地看到：乾嘉时期学问精深的所谓“吴派”和“皖派”学者，大多蛰居书屋，少与世交，钟情学术而深造自得。他们的治学范围也多在小学、历算和典章制度方面，与制艺八股南辕北辙，与天道玄理相隔遥远，与那些“掇拾巍科高第”者相比，他们突出的特点就是做人的坚实与顽强，治学的艰辛与朴实。以下就徽州学者勤苦笃实、矻矻以求的人生追求，略作胪列与阐释，以窥其自食其力，甘于贫困，性耽经书而“博学于文”的别样风采。

—
—

若论有清一代学术，江永（1681—1762，字慎修，婺源江湾人）应该称得上是第一流的学者。其近二十种著作，几乎被《四库全书》搜罗殆尽就是明证，此种荣誉在清儒中也是很少见的。他精通宋明理学，但反对空谈；用力于汉学研究，而又涉猎广博。他是清代学术由宋明理学转向考据学的关键性人物，开创了“皖派”朴学的一代新风。但这样的杰出人物，却一生蜷伏穷山，闭门潜修，终老明经，未及闻达。钱大昕记其事云：“江先生永，字慎修，婺源人。少就外傅，与里中儿治世俗学。一日，见邱浚《大学衍义补》，书中多征引《周礼》，奇之，求诸积书家，得写《周礼》正文，晨夕讽诵。为诸生数十年，键户授徒，束修所入，尽以购书，遂博通古今，尤专心于《十三经注疏》，自壮至老，丹黄不去手。尝一游京师，同郡程编修恂延主其邸，桐城

① 《江慎修先生事略状》，《戴震全书》六，第413页。

② 《与段玉裁书》，《戴震全书》六，第542页。

③ 《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8页。

④ 《清代徽人年谱合刊》上，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329页。

⑤ 参见拙著《戴震考据学研究》的有关章节，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方侍郎苞素以《三礼》自负，闻先生名，愿一见。见则以所疑《士冠礼》、《士昏礼》中数事为问，先生从容置答，乃大折服。荆溪吴编修绂，于《仪礼》功深，及交先生，质以《三礼》中疑义，往复辩难，叹曰先生非常人也！”^①

据江锦波《江慎修先生年谱》和许多民间笔记所载可知：江永曾祖父江国鼎经商于江淮之间，未能巨富而有善行，人称江善人；祖父江人英介于读书与经商之间，为典型的“亦商亦贾”者；其父江期因此得以寄籍江宁，专心从事于科举，极少回乡探视，但至死也未能中举。江永21岁时就中秀才，却从未参加过乡试。曾在乡试之地江宁陪侍父亲应试，住在同族江义文家，却以设馆授徒聊为生计。稍后“侍父归里，旋丁父忧”。^②清末民初的陈去病曾任徽州中学教员有年，于徽歙乡间轶事多有记述，云：“江慎修微时，家亦甚贫。尝上郡应试，而窘于资，不得已，乃为人担荷行李而前，因得相随入试。然江家婺源，去郡且三百里，而先生独不惮劳勩，从事于此，则其志行之卓立可见矣。昔晦庵临终，以‘坚苦’二字励门人。若慎修者，可谓能实践其诚矣。《诗》有之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余于先生亦云。”^③一介书生竟然依靠为别人做“脚夫”挣得去府学应试的斧资，“得相随入试”，其家境贫困至极已可想而知。那么，再欲参加省城乡试，已绝无可能；若另走经商之路，自然也是空口白话。唯一的路径，便是到别人的家塾去做塾师，以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之计。考察徽州地图可知，江永60余年塾师生涯的行动路线，无非是在岁试之路上奔波，从婺源江湾、婺城（县城）、大畈（外舅家），到休宁五城山斗（程恂家），再到歙县（府治所在地）的西溪（不疏园）、灵山（方矩家）。江永也从21岁为县学生，到24岁补廪膳生，再到62岁为岁贡生。为了生计，更为了读书，不惜“束修所入，尽以购书”。江氏一生中除了一游京师与江西之外，终身不出徽州，淡泊自如，与世无争，享年82岁。至于江永与科举士子之间的关系，钱大昕有记云：“（乾隆）丙午，江南乡试，以《乡党篇》命题，士子主先生说者皆得中式，由是海内益重其学。”^④江氏之书使他人得以中式，自己却以贡生终老于家。江藩也称其“所著《乡党图考》、《四书典林》，帖括之士窃其唾余，取高第，掇巍科者数百人，而永以明经终老于家，岂传所谓‘志与天地拟者，其人不祥’欤”。^⑤言辞间颇有替古人鸣不平之气。江永尝自述所学所为与时尚时文之异，云：“科举陋习，少即厌之，不得已而遂行逐队，身厕科举之林，心游科举之外。”^⑥是“厌之”，抑或“遂行”，此言或许是夫子自道的无可奈何，也未可知。江永曾与同乡汪绂有言曰：“盖食贫不免授徒，授徒须讲时艺。”“虽遂行逐队，不免从事举业，亦谓不过头巾茶饭。若圣贤茶饭所以果腹而润身者，毕竟不在此。私心以为，天下无不当读之书，无不当讲之事，无不当穷之理。但随吾力所能至，与吾性所最近者，孜孜矻矻而为

① 《江先生永传》，《潜研堂文集》卷三九，《嘉定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② 《江慎修先生年谱》，《清代徽人年谱合刊》上，第59页。

③ 《五石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陈去病（1874—1933），吴江人，南社创始人之一，东南大学教授，1906年左右曾在徽州任中学教员。

④ 钱大昕：《江先生传》，《碑传集》卷一三三。

⑤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之“江永”条，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⑥ 《答汪绂书》，《双池先生年谱》，第177页。

之。”“头巾茶饭”一语虽然是塾师身份的自嘲，但对于江永而言也最为重要。江永终生以教授生徒为业，围绕着应付的时文与钟情的学术，既不失生计，也就性之所近和力所能至，“孜孜矻矻”于圣贤事理。自言：“为己之学最寂寞，其中甘苦独喻之”，可谓其心灵真实的写照。在徽州做教谕时的刘大槐，即以古文名与当时，对江氏的“好古”之心与“迍遭憔悴”之境，也曾“蠹然流涕以悲”，所作《江先生传》云：盖先生生而好古，而穷不见用于世，则益专其心于远稽遐览，终身乐之无休暇。其于古之制度、名物，必参互而得其据证。先生未之辨明，则其说具载方册之中，而人顾莫之见。及先生指以示人，则人皆恍然自失，而不啻其心所欲言。信乎！其为博闻强识之君子也……先生存，则颓然一老，力学于深岩绝壑之间，朝士大夫无过而问者。先生没，则斯文沦丧，后生新进，猝有志于学问，于何执经而请业焉？此士之迍遭憔悴，为举世之所不为者，闻先生之卒，不能不蠹然流涕以悲也。^①

江永之学博大精深，虽至今日仍未能得识其精微。若追溯江氏学行，也正是因为能够“力学于深岩绝壑之间，朝士大夫无过而问者”，才得以深造自得，终成大儒。即如梁启超所言：“俗既俭朴，事畜易周。而寒士素惯淡泊，故得与世无竞，而终其身于学。”^②虽然江永弟子名满天下，但自己“素惯淡泊”，“志行卓立”。他以“坚苦”二字体现了徽商和徽州学人，即使是在奔命于头巾茶饭之时，也能够“志与天地拟”的精神风貌。由江永的勤苦笃实及其为此所付出的心血代价，我们能够看到：徽州学人在芸芸清儒中确乎可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徽州休宁人）的卓越成就除了天赋异禀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艰难的境遇、怀疑的精神与坚韧的性格。其后裔戴琴泉回忆云：“明末流寇之乱，徽地以僻处山中，独获完善，休养生息。至乾隆朝，故徽属最称殷富。维时族之人多务商业，以豪侈相尚，虽未知为学之道，而故家大户藏书颇富。公（按：戴震）父为族人经布业于江西之南丰。家寒素，无力购置之本，多向族人假借。公记忆力极强，钩稽参考，夜以继日。”^③戴震祖上皆平民，以农耕和商贩为业。东原少时过目成诵，却“家寒素，无力购书”，也“不获亲师”。10岁入村塾读书，受朱子《大学章句》，便诘问塾师：朱子何以能上溯千年而知孔孟之意？20岁左右跟随父亲在江西南丰和福建邵武经商和课徒；30岁时“其年家中乏食，与面铺相约，日取面为饔飧，闭户成《屈原赋注》”，却“处困而亨如此”。^④33岁时，乡里豪强侵占其祖坟，并贿交县令。东原只身徒步进京，欲问“天理”何在。“行李衣服无有也，寄旅于歙县会馆，饘粥或不继，而歌声出金石。”^⑤此后的数十年，戴震几乎无家可归，落拓江湖，以幕客为生。

在歙县西溪汪氏不疏园中的学习和课徒生活，是戴震成学的关键时期。其弟子汪灼回忆云：“先生名成于征聘，而学之成原于两馆余家。当是时，室人无北门之叹，又得

① 《刘大槐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166页。

② 《清代学术概论》，第65页。

③ 《戴震全集》五，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7页。

④ 《戴震全书》六，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662页。

⑤ 《戴震全书》六，第666页。

通博艺林，先严力助之也。先生目直视，光炯炯射四座。学宗汉郑君康成，六经、秦汉之书无不读。随读研究，析疑义，明制度，岂非考之约而览之博与？尝忆儿时入塾，先生授《说文解字》，俾逐字寻六书之义，因训曰：‘读书始于识字，积字成句，累句成文，庶免扞格难通之弊。日为余功认十字，计三载可竟功。当读之书，不外圣贤经传；文可法者，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而已。近世工剽窃，尚腔调文，与俗近者去古远，汝曹慎之，勿学也。’与先严同学不疏园，南东异室处，偶读书有得，未尝不来先严处，分榻坐，抵掌谈道，欢声达墙外。有村人暨他族以事白，或持文就正先严者，先生即拂衣起，归室据一席，高歌无所顾，如冰炭然。而稚川先生来，则又如冰之投水，炭之在炉，冷熟各相得。京师多达官长者，闻先生处之亦若是，以故多不理人口，然未至世皆欲杀者，以素未肯与俗争是非也。先生与东方日俱起，所读之书五色灿然，终朝握管，考核礼经，为古文辞，不作一行草字。夜则起视星斗，占人事得失。所著《勾股割圜记》，集《天官书》、梅氏、利玛窦之大成，尤精《水经》、律吕、音韵。”^①由汪氏所言可知东原卑微的出身、艰难的经历、不能容俗的性格，以及“论古姑舒秦以下，游心独在物之初”的学术旨趣。由此既印证了徽州民风的“惇朴而廉劲”，也预示了一代儒宗的由此诞生。

据载，戴震原本的生活轨迹也应如其父，最初只是为务农经商的需要而学习文字，计算账目，遇有机会也设馆课徒，借以治生而已，于帖括之学也不甚讲求与奢望。但因为“家极贫，无以为业，至是始为科举文”。^②这是东原的学弟洪榜所述，至为可信。其后，“学日进而遇日益穷，年近三十乃补县学生”，40岁中举，53岁得进士。其中，第六次会试不第，还是皇帝的例外恩遇，才使其在晚年不仅心愿得酬，且暴得大名。那么，作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戴震为何学问精博却难以进学，胡虔曾叙其事云：“戴东原震数应礼部试，分校者争欲致之门下。每于三场五策中物色之不可得。既乃知其对策甚空，诸公以戴淹雅精卓，殆无伦比，而策则如无学者，大是异事。钱辛楣詹事曰：此东原之所以为东原也。戴中壬午江南乡试，年四十矣。出青田韩锡祚房，其文诘屈，几不可句读。后以征修四库书，得庶吉士。”^③清儒中擅长考据者多不擅时文，惠栋、江永、戴震犹过于此。他们专心求古、离异大众而曲高和寡，只落得些无奈与悲哀。李慈铭曾对清儒的才情与功力、得失与荣辱的情况有所总结，云：“盖汉儒之经学，为利禄之路，其从师传业者，无异今之举业。而国朝诸儒之学，则实与时背驰，宜其愈上而愈困也。”^④刘师培亦云：“盖处清廷之下，其学愈实，其学愈乖。”^⑤自古以来，避难趋易乃人之常情。所幸苍天不负，戴氏“以征修四库书，得庶吉士”。为了报答皇恩，戴氏校书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也因长年辛劳，而高度近视。曾告诉段玉裁云：“余乖于时，而寿似可必。后以此言告钱学士晓征，晓征曰：天下固无可必之事也。金殿撰榜曰：先生之坚强，穷困时能日行二百里，发愿成《七经小记》。余语之曰：岁不我与，

① 汪灼：《四先生合传》，参见《戴震全书》七，第42页。

② 《戴震全书》七，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6页。

③ 《柿叶轩笔记》，《续修四库全书》本。

④ 《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466页。

⑤ 《清儒得失论》，《刘申叔先生遗书》之《左庵外集》卷九。

一人有几多精神？先生答曰：当世岂无助我者乎？竟以积劳痿足，杜门一年。中屡换眼镜，最后鬻眼镜者曰：‘此老光之最者，过此无可换矣。’是非不厌不倦，神太劳则弊故欤？”^①《七经小记》代表了戴震著述的最终集成，《四库全书》是东原学术事业的最高荣誉，但天不假年，于二者皆未能卒业。然而，东原壮志凌云之语、屡换眼镜之事，已足以展现出一位潜心学术、艰苦卓绝、“鞠躬尽瘁，死于官事可也”的学人形象。

三

“皖派”学者中有凌廷堪（1755—1809，歙县九都七图人）者，出生于海州，终老于徽州。其父灿然公自歙迁入海州板浦场，为灶户。六岁而孤，稍长，客扬州，为华氏赘婿。后成进士，以教授终身，朱珪称之为“君才富江、戴，远利就冷官”。^②晚年归歙，“朝披夕抹，日事著述”，无疾而终。无后，由戚属和弟子料理后事，葬于“歙西梅山十亩园，与父灿然公合墓”。^③其弟子中以阮常生、胡培翬、张其锦等最为杰出。关于他的生平与学行，阮元有传云：“凌君讳廷堪，字次仲，安徽歙县人。远祖安，唐显庆中任歙州州判，遂家于歙。父文焜业贾于海州。君生海州，六岁而孤，困苦穷巷中，母王氏鬻簪珥就塾师，粗记姓名而已。去，学贾，不成。年二十余，始复读书向学，能属文。惧时过难成也，著《辨志赋》以见志。乾隆四十六年游扬州，慕其乡江慎修、戴东原两先生之学。”^④由此，广交师友，学问大进。

徽州学者家境的贫困和科举的挫折，往往使他们对身世经历和人际情感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矜持、沉默甚或忌讳。这种太过理性的内向、沉潜和坚毅，也使得外人难以理解其内心真实的感受，而仅从外表上探得些许朴实、刚毅、不善交际的信息，如江永、戴震、金榜、程瑶田、汪肇龙等，无不如此。但其中也有个别的例外——凌廷堪，他既是一位“骆驼”式的学者，也是一个善于表达情感和内心世界的诗人，他能够将徽州学子无家可归、屡困场屋的悲惨境遇畅快地表达出来。李慈铭评析凌氏诗文集云：“其格调清俊，时有佳句。乾隆中经儒之称诗者，沃田最胜，兰泉次之，先生诗可以上肩西庄，下揖芸台。其中往往自出名论，又时证发经义，则诸家所未及。”^⑤那么，我们从凌氏诗文中也可以约略地获得更多徽州学者历尽艰辛、勤苦笃实以立德立言的形象与心迹。譬如，《手钞诸经跋》一文云：余幼而孤露，学书仅足记名姓。服贾入市，舍筹而嬉。少长，辄以意为诗文词曲自娱，六经未之全睹也。年过二十，亟思发愤读书，是以有《辨志赋》之作。后以负米出游，时借主人之经读之，文义渊深，苦不易晓，倦而弃去者屡矣。乾隆庚子冬，两淮巡盐御史长白伊公奉旨删改古今亲剧传奇之违碍者。次

① 《戴先生年谱·附著述辑要》，《戴震全书》六。

② 朱珪：《题校礼图用昌黎荐士诗韵为凌次仲进士作》，阮元《定香亭笔谈》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本。

③ 张其锦：《凌次仲先生年谱》，《凌廷堪全集》第四册，黄山书社2009年版。

④ 《次仲凌君别传》，《研经室集》二集。

⑤ 《越缦堂读书记》，第1078页。

年，属余襄其事，客扬州者岁余。吴人孝廉李勉伯先生赠余诗，有“莫将椽似笔，顾曲误垂名”之句，于是感其言，复取诸经就枕上观览。同人或阻之曰：是学甚难，不若诗文之易见长也。是学甚朴，不若诗文之华而悦俗也。余皆不谓然。夫学求为己焉耳，岂以难易华朴易虑哉！且未通一艺，而自命为文人，亦文人之羞也。自是有暇即默诵，而艰于记忆，乃自课以手抄代读。然寄食于人，几案少隙，或作或辍，二年中始钞得《诗》、《书》二经。时未得注疏，但就锡山秦氏本钞之。壬寅冬，入都，及覃溪师之门，命之习举子业，复钞得《周官礼》。丙午下第，归胸浦，又钞得《仪礼》。戊申，部臣新定科场例，请《五经》并用，通场同题，以杜关节。上以士子《五经》未能遍习，命本年先用《诗经》，次年会试用《书》，次《易》，次《礼》，次《春秋》，五科后再以《五经》同出题。是科余以副榜准贡。冬，归自京师。次年，将试于江宁，春间又钞得《易经》，尊功令也。余钞诸经，初不为应试计，而中副车则以《诗》，领乡荐则以《易》，捷南宫则以《礼》，前此肄业太学，则以《书》也。《盘庚》曰：若衣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夫操豚孟而祝，敢曰力穡，而有秋之报，亦云厚矣。然九年之久，止钞得《易》、《书》、《诗》、《周官》、《仪礼》而已，《戴记》、《左传》以文多尚未遑从事，他日当与《公羊》、《谷梁》、《孝经》、《尔雅》等陆续补钞也。辛亥三月，捡旧篋重加辑治而藏之，并书数语于卷尾，以见饥寒奔走读书之不易云。^①

凌廷堪在“寄食于人”的情况下，“以手钞代读”而成学业，其艰难境遇可想而知。笔者之所以详引其文，意在通过凌氏自述其读书、谋生、科举的生活经历，借以考察游食的徽州学者“饥寒奔走读书之不易”，这也是所有“皖派”学者或多或少都曾经历过的，只是凌氏较之善言而已。在关于“难易华朴”的治学旨趣上，凌氏也天然地具备徽州学者所具有的朴实敦厚学风。对于朴学“甚难，不若诗文之易见长”和“甚朴，不若诗文之华而悦俗”的劝阻，凌氏不以为然，而倾心用力于六书九数与典章制度之学。常自叙治学思想云：“少困饥寒，学贾不成，年二十余，去而佣书，不知时文为何等也。暇日窃借经史读之，人咸以为笑，谓不从时文人，终无是处也。嗣是见作时文者，辄怖之。然与之谈论，又往往不满人意。疑时文别有秘传，乃宛转叩作时文之法于人，则又笑曰：是甚难，有理、有法，非童而习之不可。如子之年，尚奚及哉？于是退而自悲。因忆《戴记》所云时过而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斯言不诬也。至是遂绝意于时文。”^②凌廷堪原本并无读书机遇，为了生存，服贾入市，“学书仅足记名姓”而已。但凌氏却能够在“寄食于人”，无以获书的情况下，“有暇即默诵”，凭着手抄的笨工夫，以坚毅稳健的心态完成了从“佣书”学徒到著名学者的人生蜕变。可以说，凌廷堪“少困饥寒，学贾不成”和“窃借经史读之”的遭遇与经历，代表了一般徽州学者的成学历程，也是学者“徽骆驼”形象的最切实、最有代表性的体现。

通过以上诸位徽州学者的生平经历和学行记载，可知徽州的艰苦环境与朴实民风反映在学人身上，必定会有相应的敦本实学、坚忍不拔的治学风尚。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徽州学人这种勤苦笃实和顽强的“徽骆驼”形象，与后人所称“综形名，任裁

① 《手钞诸经跋》，《校礼堂文集》卷三〇。

② 《学勤斋时文自序》，《校礼堂文集》卷二八。

断”，空所依傍，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极为契合。由此可见，传统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实践对徽州的影响极其深远，它是徽州宗族和社会建设的指导思想。当然，这种情况也适合于中国其他区域文化。结合现实，探讨历史，建构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对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对当今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